

交往的功能。”（见《天津宗教史》第320页）同时也指出“宗教又有绝对、排他的消极作用，如果宗教和社会双方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发挥破坏作用。”（见《天津宗教史·序》第5页）又如，对天主教、基督教在天津的传教活动，既充分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一面，也肯定了其在天津地区办学、建医院、孤儿院和适时开展救济灾民活动，以及肯定其开办《大公报》、《益世报》、《新生晚报》、“北疆博物馆”等新闻报纸、文博事业对天津与全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出现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另一面。再如，对于天津各界名人包括在津门做“寓公”的北洋军阀头面人物晚年参与居士林活动学佛行善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分析和记述，使人感到公允、中肯，符合客观实际。

《天津宗教史》从一个侧面记述阐发了天津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津的历史发展，了解信众的信仰习俗、精神生活，进而团结广大信众凝聚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作者温克勤，天津社会科学院原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sup>\*</sup>

——蕾拉·艾哈迈德《无声的革命》述评

周传斌 胡美娟

最近，一部研究穆斯林女性与面纱问题的著作《无声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获得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2013年度格威文美尔奖。<sup>①</sup> 该书的作者蕾拉·艾哈迈德教授出生于埃及、求学于英伦、任教于哈佛，穆斯林价值观与西方视野的糅合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使这部书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 一、蕾拉·艾哈迈德其人及本书梗概

蕾拉·艾哈迈德（Leila Ahmed, 1940—）生于开罗，20世纪60年代末外出求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位。1981年任美国马萨诸塞安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教授；1999年任哈佛大学神学院宗教与妇女研究教授，是该院第一任女性学研究教授；2003年至今任哈佛神学院的维克多·S·托马斯神学教授职位（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of Divinity）。

蕾拉教授在欧美的求学经历与学术任职，使她的思想底色也呈现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她早期对穆斯林妇女问题，尤其是对面纱问题的认知，具有明显的西方视角与认同。但在深刻的自我意识革新过程中，蕾拉教授的智识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也因此为伊斯兰与妇女研究领域创造出了卓越的学术价值。

《无声的革命：面纱的回归，从中东到美国》一书为蕾拉·艾哈迈德教授的新作，201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就穆斯林妇女及其历史、社会地位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东西方穆斯林妇女研究者的关注。

《无声的革命》一书包括谢辞、导言、正文、注释和索引，其中正文部分达306页，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为“伊斯兰复兴与面纱：从兴起到移民”，分为八章，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面纱如何从消失到复兴并进而通过移民而波及美国的历史过程。纳赛尔时代的埃及追求西化，摘除面纱、裸露头发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与面纱首次强势回归。作者通过调查资料分析了妇女重戴面纱的原因，探讨了伊斯兰复兴与面纱回归的内在关联。到90年代末，戴面纱的妇女已成为埃及压倒性的多数。除

\*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3LZUJBWYJ004成果。

① 格威文美尔奖创设于1984年，分别授予全世界在教育、改善世界秩序、音乐创作、宗教和心理学五个领域有杰出思想和理念的个人。宗教类奖项由路易斯维尔大学和路易斯维尔长老会神学院评选颁出。

中东以外,伊斯兰主义在这一时期也已经输入欧美,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9·11”事件之后,穆斯林在美国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下编题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新动向”,分为三章,重点讨论“9·11”事件引发的关键转折,以及美国穆斯林妇女对面纱这一符号的创新运用。作者指出,“9·11”之后,针对伊斯兰教的污名化、妖魔化宣传与污蔑,致使穆斯林在美国遭受种种不公,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尤其是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而此时穆斯林妇女对面纱却有了自己的新解释,面纱成为表达认同、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符号。

## 二、词与物:无声革命的历史过程

蕾拉教授对伊斯兰教与妇女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她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亲历面纱曲折的历史。蕾拉教授对面纱研究的突破,在于最终打破了文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压迫与被压迫、男人与女人等二元对立思维,揭示了女人戴面纱有多种原因,不戴面纱也有多种原因。

### 1. 面纱的起源:圣洁的象征

据研究,中东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播之前就有戴面纱和遮蔽身体的习俗。蕾拉教授指出,《古兰经》中的“黑加布”一词只用于先知的妻子们,没有用于其他妇女。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初衷可能只是为了仿效被誉为“信士之母”的圣妻们。“黑加布”(حجاب, hijab)制度最终适用所有的穆斯林妇女,乃是后来伊斯兰经注学家和教法学家的阐发。<sup>①</sup>9—14世纪是伊斯兰文明最灿烂的时期,但妇女却逐渐在知识领域中隐退。随着妇女蒙上面纱,早期穆斯林妇女所享受的自由和公共生活消失了,延续数世纪的性别隔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穆斯林妇女的信仰实践。

### 2. 面纱的消失:当伊斯兰文明遭遇西方文明

19世纪以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面纱逐渐被西方作为伊斯兰教低俗的明证。蕾拉教授认为,殖民主义者利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用殖民主义绑架女性主义,亦即:白人男性赋予自己一种使命,将有色女人从有色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1956年,牛津历史学家艾伯特·豪拉尼(Albert Hourani)指出,埃及面纱的消失始于20世纪初,其动因是埃及学者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于1899年发表的《女性解放》一书。艾敏谴责当时社会的多妻制、面纱与隔离制度,认为这是穆斯林社会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原因。他认为妇女应该抛弃面纱,而这并不违背伊斯兰精神。此时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等不少阿拉伯国家,面纱迅速消失,摘面纱被视为穆斯林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最初,作为伊斯兰女性主义者的蕾拉教授也赞同这一说法。但经过深入的研究,蕾拉教授认为,摘面纱既是现代性的诉求,也被当作了20世纪初妇女解放的象征;而这些对面纱的东方主义式的解读,其实颠覆了面纱基于穆斯林世界的本土意义。

### 3. 面纱的回归:伊斯兰复兴

20世纪末至今,欧美社会一直认为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即代表着宗教虔诚。而蕾拉教授认为面纱是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的象征。蕾拉教授的文献分析与调研也证实了她的这一假设。她指出,伊斯兰复兴的社会背景是穆斯林民众对世俗化代价的反思,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量。穆兄会成立初期即要求妇女带面纱,他们认为妇女戴面纱是伊斯兰教的基本要求,同时反对中上阶层生活方式的西化。在埃及的无面纱时代,穆兄会妇女继续戴面纱,坚守在社会的边缘。面纱作为一个符号,象征着穆兄会对主流社会的抗拒。20世纪70年代,随着纳赛尔时代的结束,长期受压制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重新活跃,面纱也迅速复兴。

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兴起女性主义研究,她们的兴趣与田野点之一是埃及妇女的面纱回归。70年代末,爱丽·古迪(El Guindi)在其代表作《面纱:谦逊、隐私与抗拒》中指出面纱的出现与伊斯兰宗教虔诚运动有关,穿着黑加布的女性意味着抛弃西方主流的时尚、消除穿着者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差异,很好地体现了伊斯兰运动重视性别隔离与平等主义的理念。当时这种服饰仅限于校园,数量很少,且受到学校、社会甚至父母的反对。约翰·爱尔德·威廉姆斯(John Alden Williams)的研究则发现:妇女穿黑加布,或者是因为穆兄会或沙特机构给她们付费,或者因为穆兄会的丈夫威胁要离婚;而更多地是她们自己的内在需求,表达宗教虔诚、解决认同危机,甚至是为了避免公共场所的骚扰。<sup>②</sup>

① “黑加布”(حجاب, hijab),意思是帷幕、遮蔽,即在现实当中营造一种空间隔离,以求隐喻人神之间亲密与疏离的微妙关系。后来,“黑加布”一词的含义扩展到指伊斯兰教的两性隔离制度。因此,现代学术界常用“黑加布”(hijab)一词作为各种伊斯兰妇女服饰的总称,包括盖头、长袍以及面纱等。

② 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5.

20世纪80年代,阿莲娜·艾罗薇·玛格丽德(Arlene Elowe Macleod)在埃及进行了五年的跟踪调查,她总结认为,黑加布潮流最初是由妇女发起、控制,并受妇女自己的需求、选择和意志驱动的,但到了80年代末,则越来越表现出由男女共同选择的趋势。<sup>①</sup>舍丽法·祖琥尔(Sherifa Zuhur)的调研则认为,遮蔽的妇女除了解决个人困惑以外,也跟她们的自我意识与伊斯兰主义目标的关系有关。到9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已从中东扩展到欧美,面纱的回归是伊斯兰复兴最明显的成果之一。

#### 4. 面纱的多义性:“9·11”之后的西方穆斯林妇女

“9·11”事件导致了西方国家对穆斯林、包括戴面纱妇女的新一轮的敌视与怀疑。西方媒体用大量的面纱与长袍的形象,来宣传美国与西方拯救妇女的战争的“正义性”,面纱成为入侵阿富汗的“战旗”。蕾拉教授指出,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扭曲与污蔑,一方面致使穆斯林在西方遭受了诸如人身攻击等种种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也使得东方主义论调泛滥,多数人只是将妇女问题作为攻击伊斯兰教最简单的途径,并不真正关心甚至冷漠于穆斯林世界真正发生的事情——大量穆斯林妇女和儿童正在战争中遭受死亡与伤痛。因此,蕾拉教授引用美国穆斯林女性主义者莎芭·马哈茂德(Saba Mahmood)的话说:“女性主义与民主话语已被帝国主义绑架,为其所用”。

蕾拉教授的研究发现,“9·11”之后有些妇女放弃了面纱,而有些妇女却开始戴上面纱。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名女生在“9·11”之后决定穿上黑加布,这一方面是要表达一名穆斯林虔信者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是对穆斯林群体恐惧感剧增的一种回应。<sup>②</sup>奥斯汀市另外一位戴面纱的妇女认为是面纱“解放”了她,帮助她建立了强烈的美国穆斯林身份认同。<sup>③</sup>一位英国穆斯林在接受BBC采访时说,正是因为“9·11”之后的社会压力使她想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穆斯林,想让别人知道她作为穆斯林而对自己的宗教、遗产和文化感到自豪。穿着黑加布对她而言,“是一种团结全世界穆斯林妇女的行动”。

#### 三、面纱意义的当代转型:女性主义回归

在写作本书之前,蕾拉教授与许多人的观点一致,认为面纱是伊斯兰家长制、妇女受压迫的遗物,戴面纱的人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而不戴面纱代表“进步与文明”。而在深入研究之后,蕾拉教授发现妇女决定戴面纱有多种原因,面纱现已从其历史绑定的意义中解脱出来,转而成为穆斯林妇女表达认同的符号,追求平等、自由的符号。她认为,除了穿黑加布的妇女提供的解释,也还有更多途径可以探讨面纱问题,例如面纱作为时尚宣言,以及用于自我与身份认同的建构、表达等。面纱这一符号的意义,在经历了其神圣起源、男权话语、殖民话语、后现代彰显的历史演变之后,其发展逻辑最终应该是回归女性本位的立场。

蕾拉教授的研究发现,妇女穿黑加布的目的包括呼吁性别公正、呼吁对少数群体的公正、公开族群身份、让社会意识到她们的存在等。<sup>④</sup>著名美国黑人穆斯林女学者瓦杜德则将其作为展示自己身份与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是一名皈依者,正式皈依之前我就开始遮盖头发、穿长衣服。我是一名非洲女奴的后代,我一直怀有这种意识:在拍卖市场上,或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我们的祖先无权选择决定自己的身体将被拍出多大的价码。所以,我有意选择遮蔽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方法,我用之展示我的历史身份、个人尊严与性真诚。”<sup>⑤</sup>

面纱只是一件普通的服饰,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转型中,它却演绎成各种意义丰富的符号化表征。现代穆斯林女性开始通过面纱的去留,主宰自己的身体、表达内心的诉求。对穆斯林女性主义者而言,除了“我的身体属于我”的宣言之外,可能还有“我的面纱彰显我”的独特表达方式。毕竟,选择“裸露”还是选择“遮蔽”自我的身体,应该回归女性主义者自己的选择。

蕾拉教授的研究还显示,穆斯林妇女问题并等于面纱问题。因为就目下面纱所表达的丰富含义来看,已经远

① 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20.

② 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7.

③ 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8.

④ 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

⑤ Leila Ahmed. *A Quiet Revolution: The Veil's Resurg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72.

远超出了性别问题的范畴。而就目前来看,多数解决穆斯林妇女问题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适合伊斯兰妇女问题解决的途径到底是什么?这仍然是世俗女性主义者、穆斯林女性主义者以及伊斯兰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正在努力求索的问题。

(作者周传斌,1972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导;胡美娟,1977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民族学研究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 汇集着多科知识和探索空间的 《中国三阶教史》

严耀中

张总先生的新著《中国三阶教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了,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佛教史上湮灭的教派”。中国的所谓教派,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它有着自己所谓从“初祖”开始的传授系统。没有了这个系统,教派也就无法“传灯”。由此没有了承袭的香火,被后人所遗忘或漠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然而三阶教在隋及唐初之风光,不亚于其他的教派,即使是遵奉达摩为创始人的禅宗恐怕在当时的影响上还比不上它。这种教派的大起大落是使人饶有兴趣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张总先生的书就是为此而写,不过这不仅是一本考证记叙了中国三阶教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演变的通史,而且是一本述论近代以来对这个教派如何进行研究的学术史,作者为此收集了有关三阶教的论著178种。因为所谓学术史包含着相关学术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探讨和进步,对后来者有着很大的启迪性,所以这是一本学术含量很高的专著。

从做通史的角度来讲,首先是要全面地收集和考订史料,包括对前人用过的材料进行真伪的辨别。为写好这本书,仅在敦煌文书中的相关《七阶礼》文献,作者就过眼百余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学者,如此则有利于对整个教派历史的全面叙述。其次,要对这些史料逐一考订真伪,进行分析并予以适当评价,以作镜鉴。如作者梳理了以“七阶”为代表的阶次佛名发展链条,继而展示出“多层次阶次佛名礼忏之仪制”。因为这不是一本史料汇编,而是把同类史料里选出最能反映现象说明问题的当作例子,然后串联起来。一个教派的兴衰和规模,就能渐渐地从书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再次,把三阶教的形态和内涵交代得脉络清楚,还得有很好的文笔,引起读者破解历史谜团之兴趣。可能是因为张总先生接受过很好的美术陶冶,加之书中配插着一些精美的照片与图表,使得读者对这个教派的认知更具形象化,在不同层面上会有不同的收获。由于这本书汇集着宗教学、历史学、图像学、考古学、美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因此无论读者以前对三阶教有多少认识,打开这本三阶教史,总归会有新的收获。

作为学术史来说,其难点不是在于对以往研究成果之罗列,而在于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分析,一一展示其成就和不足。这并非是指点江山,而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把道路摸索清楚,为自己也为今后的学者。该书所表现出来的研究手法,不仅在于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物的结合,还有作者的实地考察与图像比较鉴定,如对所谓《海禅师方坟记》的二块“原石”之来龙去脉所进行的详细解析。因此其史料基础十分坚实,从而有了不少创见。如认为洛阳大敬爱寺“壁画之内涵,较三阶寺院之壁画题材更近于三阶教观念”。这说明三阶教“在寺院窟像的表现与一般潮流共通,其教义观念与艺术形态并非呈现独立体系”等等。

或许正是因为“三阶教”在历史上似乎昙花一现,所以有关的研究论著就比较的少。但若是“昙花”,则有其如何耀眼光辉之可述;如何竟是“一时”?亦当有深因之可寻。在三阶教的历史中,它如何会“屡禁屡起”?甚至在会昌灭佛之后,“当时不少寺院中仍有三阶院”,“应该仍有一些僧人坚持三阶佛法,使之略有垂续”。这些结论都突破了常见,作者于此进行了说明。

通过详尽无遗地把三阶教和当时其他佛教教派从文献到教义进行了比较,使读者清楚地知道了彼此之间的各